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de Bashu Shiye



主 编 李 怡 肖伟胜
副主编 颜同林 张武军

中国现代文学的 巴蜀视野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 重庆市重点社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庆视野研究”
- 四川省教育厅巴蜀文化中心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研究”
- 四川省教育厅四川思想家中心项目“郭沫若、巴金、李劫人文学思想比较研究”
- 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项目

中国现代文学的 巴蜀视野

主 编 李 怡 肖伟胜
副主编 颜同林 张武军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李怡,肖伟胜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2006.6

ISBN 7-80659-835-9

I. 中... II. ①李... ②肖...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四川省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1759 号

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 李怡 肖伟胜 主编

责任编辑	李 蓓 谢正强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028)84122206
版 次	200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30mm×170mm
印 张	18.125
字 数	400千
书 号	ISBN 7-80659-835-9/I·263
定 价	3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引 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巴蜀视野	(1)
绪 论 全球化语境与区域文化视野	(6)
第一章 巴蜀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17)
第一节 四川近代媒体的出现与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17)
第二节 《渝报》与重庆近代传媒	(31)
第三节 域外的惊觉：《鹃声》、《四川》中的巴蜀忧患	(44)
第四节 《草堂》文学群体与中国现代文学	(53)
第五节 《浅草》文学群体与中国现代文学	(64)
第二章 现代四川文学思想的成熟	(81)
第一节 郭沫若的文学思想	(81)
第二节 巴金的文学思想	(101)
第三节 李劫人的文学思想	(112)
第四节 郭沫若、巴金、李劫人文学思想的比较	(124)
第三章 重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演化	(140)
第一节 重庆文学中心的形成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渝派”特征	(140)
第二节 北碚文化圈与中国现代文学	(150)
第三节 战时复旦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168)
第四节 巴蜀“荒地”与路翎小说	(181)

第五节 张恨水 40 年代小说与重庆	(186)
第四章 中国战争文学版图中的巴蜀文学	(198)
第一节 延安文学的“突击”特征	(198)
第二节 巴蜀文学的生存关怀	(209)
第三节 昆明与重庆：大后方文学的两个端点	(224)
第五章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巴”“蜀”互动	(236)
第一节 区域文化的文学显现：巴不如蜀？	(236)
第二节 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政治中心倾向 ——大后方文学遗产的“重庆现象”	(248)
第三节 “巴人”的“西蜀”情结 ——以何其芳为例	(260)
余 论 巴蜀学派与当代批评	(274)
后 记	(283)
附 录 本书撰稿人简介	(285)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巴蜀视野

在我们既往的感觉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只有一个统一的立场与角度，不同的研究者极力寻找的恰恰是我们彼此可以认同的部分：比如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比如中外文化的关系问题，比如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与文学的互动问题等等，似乎我们愈是在观念与立场上达成了沟通，才愈是显出了文学研究的进展。但是，这里有一个东西却很可能被我们所忽略，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观念与立场其实都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文化当前的中心城市为标准的——要么北京，要么上海，好像总是这一两个中心城市在为我们引入、创造理论框架，而其他的研究者只需按图索骥地加以运用就可以了，对于中心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重要的便是及时获取和吸收中心城市的“先进文化”，及时用作我们研究的“指南”，如果不能进入到中心城市为代表的“先进文化”的话语中去，我们就“落后”了，“失语”了。

这些现象的合理性便在于它的确反映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实际处境：我们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是在少数“先进”城市的“领导”下“走向世界”，或者说走向今天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们的文化发展与思维发展大体上都“默认”了这样的一个模式——由中国留学生将“先进”的外来文化搬运、输送到国内的少数中心城市，又由少数中心城市再渐次向“下一级”中国城市传输，渐次传输的过程便是“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减少的过程，于是对于北京、上海之外的“外省中国人”而言，重要的就是不

断向中心城市的再靠拢与再学习，不断自觉接受中心城市的文化引领。然而，这近似于“文化等级金字塔”式的一切都是绝对合理的吗？

当然不是。实际上，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他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着文化。前者已经证明了人与各自的生存环境的紧密联系，而后者更说明了我们自己的主动性。当然，我们生存的地域本来就是与北京、上海之类的所谓“中心城市”不同的，北京人的喜怒哀乐自然不可能代替远在西南内陆的四川人、重庆人，四川人与重庆人所可能进行的文化创造也不是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就能够完成的。只不过，在一个不断拱卫着“文化等级金字塔”的社会里，我们常常是掩盖了自我真实的需要和可能罢了，而掩盖的最终结果其实又是对不同地域与不同个体的生命活力的压制与弱化——它从根本上阻挡了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整体繁荣。

在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偏居西南的四川与重庆，在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往往受动于东部沿海与政治中心城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却不是全部的历史事实，更不是文化与文学创造的丰富的事实。通常所谓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四川与重庆（统称巴蜀地区）其实有着相当生动的体现。从“五四”时期白话诗歌最早探索者之一的叶伯和到“狂飙突进”的郭沫若，从浅草文学社的主力到三四十年代影响中国文坛的李劫人、沙汀、艾芜，还有公认的世纪文学大师巴金，以及作为现代诗歌运动大本营之一的种种流光溢彩……地域的偏僻显然并不能掩饰其中文学个性的光彩。到抗战时期，国际军事形势的巨变更使得中国文化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方面，我们认为，抗战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最重大的改变就是它以一种“强制”的方式颠覆了中国文化的固有格局：北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心，但是它已经沦陷了；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文明的象征，它也沦陷了……中国仅存的文化精英都不得不汇聚到他们先前或许根本无意光临的偏远的西部——以巴蜀为中心的大西南。老舍来了，茅盾来了，冰心来了，胡风来了，梁实秋来了……沫若回来了，巴金也回来了，一个“后发达”的内陆腹地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集中了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精华。巴蜀，这个长江上游的内陆腹地终于出现了“国家级”的文坛巨擘，形成了全国性的文学组织；巴蜀山川间的生活，终于可以进入一流文学大家的视线。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温文儒雅、多愁善感的文化精英栖身于蓝衣赤脚的巴山乡民、提劲打靶的码头袍哥之间，重新打量和品味着中国的现实与人生。与皇城根脚下的

醇厚风雅相比,与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相比,巴山蜀水间发生的一切都那么新奇,那么富有冲击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作家在巴蜀地区的文学创作赢得了更好的氛围与环境,这些外来的文学巨子并没有因为抗战生活的艰辛而停止自己的文学思考。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巴蜀地区(尤其是当时已经升格为中央直辖市的重庆)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除北京、上海之外所集中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巴蜀地区的人生感受与地域体验由此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可以引起思考的东西很多很多,我们可以用“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这一框架来概括。

关于文学与区域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区域文化关系的研讨,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1995年,由严家炎先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便是其标志性的成果,以后,各种专题性的区域文学研讨之作相继问世,充分展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地域(区域)内涵方面,而如何在整个学科发展的意义上来自觉发掘区域文化的价值,进而在学科与文化互动的方面同时推进其各自的发展,还一直缺乏足够的关注。

我们的研究力图将区域文化的内在意义上升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新动力,同时将对区域精神的发掘汇入当代文化发展的大潮之中。

“视野”既是对作家立足于地域体验的思维方式的概括,也是对今天学科发展当中所包含的自觉的文化意识的提炼。前者将超越一般区域文化研究,更多局限于民风民俗的趋向,从而在一个纵深的层次上总结区域文化之于作家思维形式的影响;后者将超越仅仅从现有作品中“挖掘”地域意象的思路,努力从曾经有过的巴蜀文化的精神追求中寻觅支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以至整个文化发展的重要启示。

“巴蜀文化视野”概念的提出,既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关系研讨的深入,也是对以文学为中心的当代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推进,其意义在于:

1. 突破一般区域文学研究以民俗民风展示为主体的思维模式,以“视野”概括巴蜀文学的独特视角与精神趋向,从而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揭示巴蜀文化之于四川文学的影响。

2. 突破仅仅在四川文学范围内阐述巴蜀文化的局限性,努力在整个中国现

代文学的意义上揭示巴蜀文化所产生的意义,挖掘“巴蜀文化视野”在其他外省作家那里的价值。这样便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多样性的认识。

3. 借助文学史的阐释,进一步探讨地域文化资源之于学科发展地域特色之意义以及地域性学派形成的可能,这可谓是当前中国学术发展与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需要注意一个“巴蜀视野”的问题。今天,作为一个对巴蜀地域体验深刻的学者,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当时的价值取向之时,自然也应该将当年作家的地域性认同立场纳入其中,从而形成我们“巴蜀阐释”的独立的角度和声音。

众所周知,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在于,在真正的现代文明的国度,文化与文学的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由少数所谓的“先进城市”领导一切的情形是不可想象的。美国文化不可能由华盛顿或纽约来主持,英国也不会只有伦敦文化。华盛顿或纽约学人的思想代表不了美国,伦敦代表不了英国,我们的北京和上海也替代不了全国其他地域。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世界”的思潮中,我们不断争论“愈是民族,才愈是世界”还是“愈是世界,才愈是民族”,今天,又以为“全球化时代”的“大同图景”为我们未来的一切都铺平了道路,其实,“世界”与“民族”永远是互为限度也互为说明的,“全球化时代”的提出本身也是人们体察到了各自地域需要的产物,离开了各自的地域需要谈全球化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绝对不是少数中心城市文化地位的继续巩固,恰恰相反,是更多的外省边缘文化的崛起,是中心的弱化,或者说更多中心的出现。

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有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在巴蜀”看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二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看巴蜀,尤其是看巴蜀地区的文化。

前一个方面,也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是抗战之前巴蜀地区文学形成的区域个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中,这样的个性丰富和完善着文学的追求。二是抗战时期巴蜀社会文化生态对外来作家的深刻影响。正是以巴蜀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域体验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态势——

中国现代文学生存发展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从此有了重大的变化,即从比较集中的中外文化的交融冲突转变为中外文化与中国各地域文化的交融冲突。

中国现代文学在秉承近代以来的“时间焦虑”、“进化渴望”中加入了更加明显的“空间困惑”。

中国现代作家在艺术思潮的急切追逐之外，对普通生存的现实有了更加明显的关怀。

当然，在以上分析当中，我们其实也同时是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的格局回看巴蜀，回看巴蜀区域的种种精神现象与其他区域的联系与差异，也回看“巴”与“蜀”的联系与差异。

我们的思考或许有些庞杂，但进行这样的思考本身就是巴蜀区域文化与文学丰富形态自然要求的结果。我们进而认为，巴蜀，既然已经拥有了如此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就完全应该有决心在自己的学术发展上更上一层楼——为自觉地建设一个区域特征鲜明的“巴蜀学派”而努力工作。正如一些学者早就提出过的那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是各地域性的学派的建立，中国的学术应当在“北方学派”、“南方学派”、“巴蜀学派”、“山东学派”、“广东学派”的崛起中出现整体格局的巨大变化，北京不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唯一中心，上海也不是，这两个城市也应当与它们各自的地域相结合，形成新的“北京学派”与“上海学派”。

自然，中国现代文学外省学派的建立从本质上讲必须依赖各区域学者对于自我、对于各自生存需要的更加自觉的体认，就像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样，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必须完成的过程。

绪 论 全球化语境与区域文化视野

作为对现代中国壮阔历史进程的文学写照，中国现代文学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熔铸出开放的文学品格，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使得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一度成为了引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新路向的“显学”。数十年来，每一代研究者都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结合自我的历史感悟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独特的阐释，从而构建起了具有浓厚时代色彩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框架的设立、转换往往并非源自于学术文化的自然传承演变，而是和特定社会语境的嬗变更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折射出了当代社会生活的风云变迁。换言之，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现代文学研究更易于受到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

作为研究者，我们对此理应有所警觉：一方面，对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约定俗成的理论预设要予以追问、质疑，以免受到某种既定理论模式的掌控；另一方面，又须对研究范式的每一次转换进行认真的思考，探索其中微妙的理论差异及其背后所隐藏的话语权力关系。只有具备这样一种清醒的学科反思意识，我们才有可能躲避开文化语境的巨大侵扰，才有可能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更为丰富、独到的理解，以获得某种契机，开启出崭新的研究路向。

反观十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我们会发现，随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文学研究的主导性理论语境也悄然发生了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继兴起的两种迥然有别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纠缠错结，以不同的方

式展现出关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独特认识和理解,虽然其中充满着矛盾和悖谬,但是却富于深刻的启示意义。在文化语境发生嬗变的这一关节点,通过剖析、梳理那种或中肯、或偏执的理论话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些被既有的文学史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从而对文学史上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作出更具说服力的阐释。

—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广泛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全球化”这一概念频繁地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中。一般而言,学术界将全球化界定为继现代化之后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世界性大市场的形成,世界的格局建构发生了微妙的转换,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新型国际秩序中逐渐摆脱了以往遭受抑制的被动地位,开始参与到世界事务中来,从而得以以一种全球化的视角来审视既往的历史,思考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角色定位的变化自然会导致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变革,于是,以往所热切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如今备受质疑、责难,曾被引为文化建设资源的西方文化也被视作一种危险的异己力量。与此同时,过去遭遇冷落的传统文化反而忽然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土性也被当成了衡量思想文化合法性的重要尺度。

由此可见,全球化这一概念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方面,它指称由世界总体格局转换而带来的一种历史际遇;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意指伴随这一历史变迁而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对于整体文化形态而言,后者的影响力则更为重大,“全球化,这在过去的十年里作为一种变化的范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想象——已经取代了现代化”^①。换言之,全球化已经代替现代化成为了全新的时代背景,并引发了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刻嬗变。

在全球化语境中,一种以空间观为立论基点的批评范型应时而生,并显露出异常犀利的批判锋芒。这种批评范型预设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就是空间意义上的民族性同标举线形历史发展观的现代性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关系。在这里,空间其实是寓指一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的思想立场,借以凸显现代性时间

①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观的西方化本质，而其目的就在于从民族性视角对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检视和重估。应当承认，无论是弘扬民族传统的永恒价值还是对现代性追求中所存有的种种缺憾予以深刻反思，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当代意义，这种批评模式所开辟的空间化理论视野确实颇富启发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因其过分执著于本土立场，它所秉持的这种空间观不免又显得有些褊狭，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理论上的误区，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这种理论缺陷自然显露无遗。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一异常活跃的“全球化”批评观把批驳的矛头指向了所谓的“现代性宏大叙事”。批评者们认为，在中国它“主要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这实际上便是“承认了西方描绘的以等级制和线形历史为特征的世界图景”^①。他们继而声称，现代文学自其生成之初便将从西方引进的进化论奉为圭臬，由此而虚设出先进与落后相对决的文学秩序。在这一线形时间观的引导下，空间意义的民族文学自然被放置在弱势的位置上，而西方文学则俨然成为了现代文学追求的唯一目标。由于“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②，现代文学其实是西方话语霸权在中国的投影，民族文学传统在这一阴影的笼罩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断裂。

彰显民族文学的价值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的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这种批评模式却借用空间/时间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把文学中的现代性和民族性截然对立起来，势必会导致如此偏执的结论。对其立论依据作一认真分析我们便会发现，这种批评观之所以在理论上存有种种含混、悖谬之处，原因就在于它将现代文学丰富的发展历程规约成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在这些批评者们看来，民族性是乡土传统文化的代表，因而与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具有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文学的开拓者自觉引介西方文化文学，结果就使得民族性遭到了颠覆、消解。在这里，我们要追问的是：这一斩钉截铁的逻辑推断能否涵盖文学史生动、鲜活的大量细节？民族性果真与传统文化相等同？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叙事是在何种介质中融入了现代文学创造的进程？在近现代的历史转型中，传统文化

①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②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文学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全球化”批评模式仅凭其褊狭的空间观念显然无力对这些问题作出富于学理性的解答。

对“全球化”批评观作一全面考察便会发现,这一理论范型虽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新的时代语境,但其指归却在于对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模式进行质疑和颠覆。众所周知,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拨乱反正”政治潮流的涌动,现代文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以“走向世界”为学术取向的追求现代化的研究理念,它“代表的是刚刚结束十年内乱的中国急欲融入世界、追赶西方‘先进’潮流的渴望”^①。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章中,研究者们曾作出这样的表述:“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②很显然,这种文学史观所凭借的理论依据是独重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线性的时间观自然就成为其审视文学发展历程的重要视角。纵观80年代推出的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微观的作家作品评论还是宏观的文学思潮流派论述,皆把“现代化”标准引为进行文学价值评价的主要尺度。也就是说,研究者们是以世界文学为坐标建构起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叙事,而时间无疑就成为了这种文学叙事的主导性因素。自然,这一文学批评观因着重于现代文学发展的时间性意义,不免就忽略了文学史上那些难以用时间因素进行衡量的复杂的文学现象,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留给了90年代“全球化”批评观以发起驳难的口实。

应当承认,在80年代的时代氛围中,以“文学现代化”取代“新民主主义”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依据,这种学术转型有其不容忽视的学术史价值。在经受了长期的政治禁锢之后,“回到文学自身”、“把文学史还给文学”这样的口号自然会起到振聋发聩的功效,文学因而才得以从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这一尴尬境遇中摆脱出来。对此达成共识,是我们审视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然而,“全球化”批评观不仅无视文学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对

① 李怡:《“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关键词汇》,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现代化研究模式妄加批判,而且还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借助于空间化的叙事策略指斥现代文学自身便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由此而彻底抹杀了现代文学的意义价值。90年代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发生的这一转化具有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理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危机当中往往潜藏着进行学术突破的契机。在这种情势下,我们首先须从当下主导性的文化语境中超脱出来,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中冷静思考,探察两种批评观的异同及其共有的理论缺陷,以期获得一种更为理性的文学史观。不难看出,这两种产生于不同时代语境的批评理念虽然具有种种本质差异,但是其间也有相通的一点,就是都采取了时间/空间二元对立的视角构建起了现代/传统相互对峙的理论框架。诚然,它们的理论立场截然不同,所凭借的理论资源也大相径庭,然而其学术指向却不谋而合,都试图以一种抽象的理念来涵盖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试图用某种既定的理论来裁决历史。这样,内涵繁复的现代中国文学就俨然成为逻辑预设的结果,充当了现代抑或传统的代名词。于是,种种鲜活、灵动的文学作品被研究者们非此即彼地划分到相互对立的文学类型当中,或是现代或是传统,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只不过每种批评观对于现代和传统的阐释不同罢了。由此可见,无论是80年代的现代化文学史观还是90年代的全球化批评理念,其缺陷都在于对文学史作出了过于简单化的论断,而未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现代文学的本质内涵。

与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具备其存在的合理性,原因就在于它生成于现代中国这一独特的时空境遇当中,是现代人在现代时空境遇中生命体验的文学表达。而这种现代时空境遇又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结构形式,绝不可用时间/空间、现代/传统二元对立的理论范型来孤立地对它作出界定。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现代文学并非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的翻版,从而也不可能割断传统文化的根脉,在其发生、发展的进程中即天然地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结构特性。若要深入理解现代文学的深刻内涵,我们须拥有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也就是说,要从时间、空间两个向度上对现代时空境遇——现代人进行生命体验和人生感受的生存背景——进行细致考察。

二

在近现代的文化转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这样两种异质的文明形态相互遭遇，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碰撞，二者之间既有契合之处，又不可避免地充满着悖谬。就在这一富于矛盾性的过程中，现代文化的时代语境得以生成。当下部分研究者之所以对百年来的文化、文学转型作出了简单化的判断，原因就在于对这一过程的矛盾性、复杂性缺乏深刻的理解。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作为其理论核心，呈现出大一统的结构特征。于是，人们往往倾向于把传统文化视为一种同质的总体性概念体系，以为可以凭借理论戒律对其作刚性的界定，而对它所呈现出来的多元化特征却有所忽略。其实同其他文明形态一样，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文也包含着多种文化层次，精英/平民，庙堂/民间，正统/异端，开化/保守，这种种参差不齐的文化形态都是传统文化的具体呈现形式，以不同的方式折射出传统的光芒。有意味的是，传统文化的这种内部结构特征是通过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形态散落在特定的地理区域，与各地的自然、人文环境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群落。有研究者把它命名为“儒学地域化”的过程，认为“儒学从原生的人文化型构阶段经官学化过程达致地域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也就是儒学冲破制度化、神秘化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构成不同的文化精英群落的过程”^①。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空间化布局自有其内在的哲学渊源，它体现出农业社会天人合一宇宙观重空间、轻时间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地域化的风格特点。刘师培曾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对此进行过详尽的考察，“古代音分南、北”，“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②。在自然环境、人文素养、

①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页。

②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载《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261页。

思想氛围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北各地的文学呈现出多样化的美学形态和文学品格。由此可以看出，其实在古代文化、文学传统内部，即存有空间化的多元发展的趋势。

到了近代，伴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转换，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日益衰微，各个地域的乡土文化群落日益彰显出其主体性，这种多元化的趋势也就愈发鲜明起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便不应当再把传统文化视作一个具有高度同一性的整体，因为异质性的乡土文化已使得传统文化内部的地缘性差别异常显著。当西方现代文明被引入中国时，作为接受主体的也就不再是整体意义上的传统文化，而是一种空间性的文化结构，是一个个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群落。

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西方现代文明实质上是一种时间性文化形态。“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①它产生于欧洲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主旨就在于为未来发展提供一幅进化的、线形发展的计划蓝图，因而现代性主张古/今、新/旧截然对立，强调一种断裂意识。将其视作一种现代化的启蒙方案，我们对现代性作出了上述清晰的界定、阐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凭借这种理念对文化、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抽象的演绎。有研究者曾以鲁迅、胡适、陈独秀的某些理论主张为论据，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置传统文化于不顾而独尊西方文明。这种论断的弊端就在于，把人们对于现代性的态度和现代化的史实混淆在了一起。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文化先驱们的确自觉接受了进化论物竞天择的理论主张，希望通过全面引介西方现代文明来变革中国的文化传统，这其实是显示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态度、文化策略，而并不代表进化论就已经成为指导他们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纲领。反观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即可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刘纳先生指出，我们不仅“从新文学倡导者的立场、态度与他们的具体主张之间能够辨识出其所存在的失衡、矛盾和冲突”，而且也可以认定，在“新文学运动中崛起的文学作者们，更不可能认真遵循运动倡导者所规划的思想路径”^②。历史的发展轨迹永远是人所无法预言

① 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载《学人》第6辑。

② 刘纳：《二元对立与矛盾纠缠——中国现代文学发难理论以及历史流变的复杂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